

面对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神圣的理想之光渐趋黯淡的文学现状,人们大声疾呼理想的回归与重建。理想这个词汇聚了我们所处时代的诸多矛盾。处在当今不同体制、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理想各有不同,甚至尖锐对立。这是我们讨论文学理想问题时应当正视的复杂语境。

进入新时期,在一个陌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应怎样生活?如何面对理想的悄然转型?这是每个中国人的难题,又是每个中国作家的新课题。一边是对崇高的敬仰,一边是对愚昧的鄙弃,这使我们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之中。既有的生活信念崩塌,新的人生理想尚未建立,此时此地,每个中国人都在体味着“烦恼人生”。

池莉发表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写了一个普通工人的“这一天”,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她笔下的印家厚过着清苦而贫寒、单调又乏味的生活,充满着一系列的“个人问题”。《烦恼人生》中大大小小的烦恼都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相关连。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印家厚意识到自己个体的感性生存价值,并执著地向往和追求,才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否则,他就能安然地像“文革”时期的“单面人”那样:“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问问革命老前辈”后,一切都烟消云散。漠视人的“个人问题”,忽略人的物质利益与感性存在,最终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变革不能不指向笼罩在“个人问题”上的“左”的迷雾。印家厚的烦恼有着符合历史进步的合情合理性,已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烦恼,那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他不仅有着东方人物生活困苦的烦恼,还有着西方人特有的渴求较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的苦闷。面对物质困苦,他不能用昔日田园牧歌般的“穷快活”来自慰,用虚幻的理想主义来解脱,改革开放毕竟拓展了他的眼界和心胸,朦胧的个性意识不仅使他知道应该选择怎样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将他萌生了对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渴求,这后者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反而成了沉重的精神负累。他清醒地审视自身的处境,然而越是清醒则越是烦恼,就像在手术台上,麻醉药失效后的清醒使心灵的苦痛陡然增强一样。印家厚面对觉醒了的个性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西方人在几百年中经历过的酸甜苦辣种种滋味,似乎在一个早上都涌到了印家厚面前。小说并没有提供人在今天应怎样生活的确定答案,惟一确定的是人对个体生存空间的追求。中年工人印家厚为自

己担负的种种“社会角色”压得透不过气来,诸如工人、师傅、丈夫、父亲、女婿、邻居、拆迁户……这是一个庞大的责任和义务的社会生存空间,那纯粹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即权利和享受的个人人生存空间分外狭小。两重生存空间的冲突构成了印家厚人生的主要内容。他并不企图用后者取代前者,那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会放弃一个中年人的责任和义务,他只是渴望着人的两重生存空间大致平衡,从而获得个性全面发展的条件,这是当今中国人相当普遍的现代心声,从中亦可窥见新理想主义的雏形,那就是对个人、个性、个体的感性生命存在的尊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人的个性发展似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西方文明的涌入,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勃兴,为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推波助澜。旧理想主义渐行渐远,个人发家致富的世俗理想旗帜到处飘扬。这种世俗理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人的个性的觉醒,总是伴随着个体历史主动性、创造性的高扬。在整体中只有先激活个体,才能逐渐使僵化的整体恢复活力与生机,从而加速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国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效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经过一些年的积累,其负面效应也在滋长,其中隐藏着的否定性因素也不能忽视。伴随着社会上某些人的物欲膨胀,出现了一人得利、大家遭殃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与之呼应的是欲望写作的兴起。“搞笑”作为诗意图泛滥,将“个人化写作”极端化变成了“猿人化”。文学不再“从属于政治”,却越来越多地从属于经济,从属于市场需求。政治人变成了经济人,两者都是文学的独立个性的丧失,都是人的独立人格的丧失。在金钱化社会中,人的个性自由、个体价值面临重新丧失的可能,从而远离我们向往的理想。这就必然会将新的否定提上历史行程。

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仅有现实关怀的世俗理想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着眼于终极关怀的神圣理想。神圣理想以崇高为其主要特征,追求道德上的大善与人类诗意的安居。世俗理想只反映了人的较低级状态的属性,只有神圣理想才揭示了人的高级本质属性。从人的存在来看,有三个

文学理想的重建

□江岳

层面,一是自然存在,二是社会存在,三是精神存在,反映了人的不同级别的本质属性。人如果不仅要活着就好,还要很好地活着,就必须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的同时,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仅有世俗理想,人是无法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的,只能造就残缺的人。因此,我们说世俗理想只是新旧理想主义的雏形,那就是对个人、个性、个体的感性生命存在的尊重。

当下的我们正在经历新旧理想转型的烦恼和阵痛,还有世俗理想与神圣理想冲突不断加剧带来的迷惘。面对日益物化的现实,人们的质疑不断。从“文化关怀”的讨论,到“红色经典”的复活;从“底层写作”的兴起到新左翼文学的活跃,从抵制“三俗”到呼唤公平正义等,显现出重新评估旧理想主义中的英雄情结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趋向。这也启示我们:新理想主义的重建是对旧理想主义的辩证否定而不是简单的否定。简单的否定总是摆脱不了肤浅的片面性,倒洗澡水时总是将小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旧理想主义中固然有其荒谬的丧失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亲和力的一面,但它所体现的英雄情结、集体主义精神不仅是那一时代的表征,同时也是人性中的伟大正面价值的标志,影响了一代代人,这是不应忽略的另一面。我们还要警惕:试图用往昔的“革命”理想矫正当今理想失落的现实时,不要将倒掉的脏水又连同小孩子一道捡回,重蹈覆辙。我们应对人的世俗理想与神圣理想进行辩证综合,以改变两者在旧理想主义中的分离和对抗的状态,使其在螺旋式发展的更高历史阶梯上达到统一。这样的思路不仅适合于探讨文学的理想,而且,也适合于探讨我们向往的理想。这就必然会将新的否定提上历史行程。

以审美的方式传达文学理想是对理想的文学的基本要求。新时期以来,我们对理想的文学的探索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学日益摆脱单纯为政治理服务的僵化模式,回归文学自身和审美自律。纵观人类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人类对理想的文学的探索中,人乎侧重审美自律的“内”与出乎侧重社会历史他律的“外”的矛盾运动是生生不息、历

久常新的。在文学的理想与理想的文学问题上,个体与整体、感性与理性、世俗与神圣、“内”与“外”、艺术使命与社会使命、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等诸多二元对立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从

旧理想主义到新理想主义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内容。其中的关键环节是:辩证综合。与辩证综合对立的误区是一: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把其中的一元片面化、绝对化。二、用物理性质机械拼凑代替化学性质的融合,造成两者虚假的综合统一。辩证综合的道理是知易行难的,而知行合一需要过程。实际上,近年来热闹的文学争论中,由于思维与实践的惯性,往往导致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反复发作和折腾,走不出从一种片面到另一种片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怪圈,最终殊途同归,不能完成从旧理想主义到新理想主义根本转变,始终远离理想的文字。

理想总是意味着对现实的超越,但又离不开现实。有实践价值的理想总是有着深厚的现实根基。新理想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是想天开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某些人头脑中固有的吗?也不是。一方面它要汲取人类积累的关于理想的丰富资源,包括对旧理想主义的辩证整合,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它要植根于现实的问题意识中。离开了现实的问题意识的理想,极易滑入凌空蹈虚的幻境,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强加于人。

现实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问题的世界,所以才可能需要一个理想的境界。而“问题”就是我们向往的理想境界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认识问题,可以明朗理想的大致方向;解决问题,可以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作家的文学理想是建立在对现实问题的发现、关注和审美剖析上,是从作家的问题意识中产生的。而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不仅要再现人怎样生活,更重要的是要表现人应该怎样生活。“文学是人学”。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关注人的精神存在,通过描绘人对理想的追求,并将这种追求寄寓在时代新人身上,从而获得建构人的心灵的能量。

在绚烂多彩的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上,不断有新的人物亮相。从国民性改造到新人性的探索,作家们辛勤耕耘着。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断将陈

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的前进运动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对于人对理想的不可遏制的追求来说,缺憾感也是深重的。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或许有着与新人的某种联系,在对他们“活法”的否定的理解中,或多或少蕴含着对新人的肯定的理解,但更多的还是与朝霞相似的夕阳的余晖,不过是描绘出一个现代新人朦胧的童话。对于整个新时期文学来说,新人仍是一个难解的谜。这是因为中国人寻找在今天应该怎样生活的答案方兴未艾,客观历史条件还不成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新人形象,在今天像一个遥远的梦。虽然,他们身上有着那个时代对人的“单面化”扭曲的印记,其个体意识的失落是不足取的,但如前所述,那种人性中的伟大正面价值的标志,影响了一代代人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心理形式,难道再不会唤起人们留恋和激动、不具备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不应该在更高的历史阶梯上再现出来吗?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这个更高的历史阶梯就是个体的创造力、竞争力的充分涌流。通过“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整合,我们也许会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时代新人的某些重要特征;自觉的个性意识在它的成熟发展阶段,会向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不再混同于早期贪婪的利己主义,从而创造出真正强健的个体。同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旦和自觉的个性意识结合,也将摒弃僵死、单一、虚幻的集体主义对个性的压抑,从而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与生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通过对个体的贬损来强化整体,其结果是整体的活力逐步销蚀。要使整体强健,必先个体强健。历史的颠倒,需要这样重新颠倒过来。那时,无数强健的自觉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将在我们民族历史上,重新焕发灿烂的理想之光。展望未来,经过理想的重建,中国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将会在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变革实践中应运而生,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前社会主义的否定形态,以未来的不断发展的新人的肯定形态,创造中华民族传统文学宝库中的新宝藏,谱写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的新篇章,传达慰藉人心的绵绵福音。

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37)

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和文艺思想,后现代主义虽然孕育于现代主义文化、文艺之中,但却又是它的反叛者和解构者。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走向极端之后的一种变异形态,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无奈的超越,其背后应该说蕴藏着一定的思想内涵。

后现代主义对我国文化、文艺的影响、冲击是客观存在的,它已经使新世纪我国文学艺术在主旨上显示出与此前的文学艺术的根本差别:此前的文学艺术特征是恢复、深化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主张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在大众文艺领域,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典型特征。

第二,快乐原则(非暴力、多元化、大众化)。

在后现代社会中,经济繁荣,思想观念解放,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相对弱化,大部分人的当下生存已经不成问题,追求创新发展成为急需。

这就需要年轻一代轻松地去面对,而不是老一代的苦大仇深式的思考。大众文化提倡快乐原则,提倡多元参与,拒绝对抗,它让大众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享受生活,放松身心,于是,年轻一代开始以调侃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大众文化生活。

第三,非现实的虚拟世界。在后现代社会中,没有生存问题的人不希望被标准化和物质化,经济独立的个体需要肯定自我的生存意义和承认自我的价值,而虚拟世界为他们提供了最快捷的和最有效的现实模拟平台,并且在模拟的同时也把他们的价值观念传播开来。虚拟世界是对现实的仿真模拟,它是语言和符号所构成的世界,它本身是不现实的,但却给人以虚拟的现实感,进而达到影响现实世界的目的。互联网、电视、电影、报纸都是符号化(包括文本、图像、声音等)的虚拟世界,人们一般会不假思索地相信传媒的权威性,同时因为虚拟世界的假定性,也使他们进入一种游戏性的思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多数人能够平等地认同多元化的观点。诸如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每个人可以塑造一个新的身份进入虚拟世界,可以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地和全球人对话,信息的获得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网络中每个人都是独立平等的个体。

第四,消费的差异化。

在后现代社会中,大众消费物质商品的同时也是消费价值观念,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商品对应着有共同价值观念的消费者,即后现代社会要求商品差异化、细分化,没有特点、没有创意的商品就不会有市场,这是思维多元化的物质表现。就像建筑一样,如果全世界人都住在千篇一律的玻璃和钢筋组成的房屋建筑中,现在谁还会高兴呢?物质缺乏时期制定的统一的计划已经瓦解,世界经济文化开始因为需求的差异化而开始变化,一部电影全国人看一年,一场电视晚会10亿人一起看的时代已经过去。

第五,多元文化。

没有结构就没有解构,没有解构就没有后现代。只知道后现代,而不知道结构,后现代就没有了正确的对象,就会落入低级、庸俗、无知的境地,成为无聊、庸俗的代名词。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是指传播者和受众都必需共有的语境。有着共同的知识结构体系,才有可能对结构体系进行解构,并且重新进行拆贴组合出新的意义。如,2006年初上映,现如今,各电视台重播率、网络点击率仍然居高不下的具有后现代特征的80集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对一个具有大学文化以上知识的受众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该电视剧虽然借用了武侠片的外衣,但其中许多言语都是现代文化的拼贴、戏仿,甚至还夹杂有现代哲学的文本。或者说,后现代作品更加细分受众,不同的结构对应着不同的后结构作品,也对应着有着共同价值观念的特定受众,最终的结果就是差异化、多元化。因此,《武林外传》播出后,有人发帖提出了“看懂《武林外传》的N个条件”:通读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人的大作;读过大名著;英语起码要过四级;至少知道一点莎士比亚;爱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掌握吴宗宪的说话风格;熟悉《幸运52》《非常6+1》等节目;对哲学有所涉猎;熟悉所有国内电视台的广告;热爱动漫;热爱《地雷战》《地道战》等老片,熟悉其台词;各种晚会的路数都熟悉;精通流行音乐,从民歌到摇滚,从《流浪者》到《双节棍》,尤其要精通Rap;深入钻研过《大话西游》不少于100遍;《野蛮女友》的台词耳熟能详;《超人》《六人行》都不惧,连《铁臂阿童木》都看过;对传统相声的造诣,至少得到明白

洞察

弘扬文化创造精神的文学研究

□李徽昭

事实上,学院与文学的关系已经构成一种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当代人文现象。

新世纪以来,作家进入高校的多种方式以及学院文学研究的庞大规模,接续了现代传统且发生了新的变化,并相当程度上因应了学术研究及文化全球化趋势。但一个问题是,这些研究是否建构了研究者和中国文学的文化主体性,尤其是与20世纪社会文化现代化息息相关的现代文学研究是否具有本土性、主体性的文化视野。

李徽昭等著《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下面略为《创造》)便较为充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该著以文化创造为关键词,串联起新文化语境、社团流派、文学大师、个体文学、世界化、民族化、文学批评、文学媒体、现当代文学教育及其学科构建等涉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方面,对20世纪文学的文化创造给予了相当深刻、详尽、全面的阐释。该著内外部研究结合,对文学创造的各个方面做了耐心细致的发掘。比如对现当代文学教育与学科建构等文学研究者较少思考的问题也作了独到的解读。该著对关涉文学的各方面条分缕析,呈现和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对文化创造的自觉贡献,有效解读了20世纪文学与文化应有的关联。可以说,该著的最大亮点,显示出了相当宽广的文化视野。实际上,如果对该书主笔李徽昭投身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30年的学术成果作一浏览,不难发现,其学术著作及论文涉猎范围十分广泛。他的研究不仅贯穿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也指探到与现当代文学有着密切关系的近代文学;不仅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深度阐释,也对文学大家做出深刻的研究。他的研究不仅具有较为宏阔的胸襟与气度,要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有深刻的感受与体悟,也要能够承受开代大文化视野的一种艰辛与寂寞。

《创造》着眼文化创造问题,开拓了从文化创造角度研究文学,也或是从文学角度研究文化创造的新学术空间。在《创造》中,文学已经融入到文化中。无论是五四新文化、文学社团、文学大师,还是文学批评、文学媒体、现当代文学教育,它们都是文化的产物,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共同体。该著通过对文学文化创造独具匠心的学术建构,彰显了文学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本位,以及文学、文化主体姿态与社会文化的某种内在关联与互动。也可以说,

根错节的关系,需要研究者具有宏阔的文化视野。

多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多乐于单向度介入研究对象。尽管也有部分学者号召或实践着跨学科的研究,但其所持守的仍是单一的文学本位。于是,不少的现代文学研究极易被研究对象所裹挟,被文学本位所缠绕。由此可见,当现当代文学研究仍需要具有整体观的文化视野。整体观的文化视野包含着研究者对社会文化过去与现实境况的深刻认知,进而从这一视野中获得属于文学文化本位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空间。在这样的学术空间中,较好地实现文学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重新赋予文学的文化思想信号,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学院体制打破自己视野局限的积极努力。对研究主体而言,现当代文学研究整体观的文化视野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较为宏阔的胸襟与气度,要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有深刻的感受与体悟,也要能够承受开代大文化视野的一种艰辛与寂寞。

《创造》着眼文化创造问题,开拓了从文化创造角度研究文学,也或是从文学角度研究文化创造的新学术空间。在《创造》中,文学已经融入到文化中。无论是五四新文化、文学社团、文学大师,还是文学批评、文学媒体、现当代文学教育,它们都是文化的产物,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共同体。该著通过对文学文化创造独具匠心的学术建构,彰显了文学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本位,以及文学、文化主体姿态与社会文化的某种内在关联与互动。也可以说,

《创造》着眼文化创造问题,开拓了从文化创造角度研究文学,也或是从文学角度研究文化创造的新学术空间。在《创造》中,文学已经融入到文化中。无论是五四新文化、文学社团、文学大师,还是文学批评、文学媒体、现当代文学教育,它们都是文化的产物,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共同体。该著通过对文学文化创造独具匠心的学术建构,彰显了文学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本位,